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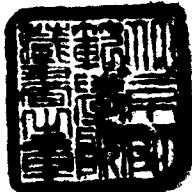


周作人散文选集

ZHOUZUOREN  
SANWENXUANJI

周作人散文选集

张菊香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28491

1128491

## 周作人散文选集

张菊香 编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武清永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092毫米 1/32 印张8 7/8 捕页2 字数180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

---

ISBN 7-5306-0021-4/l·21 定价：1.95元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周作人散文创作主要作品六十八篇。周作人是“五四”时期著名散文家，他的作品以平和冲淡，飘逸洒脱的风格独树一帜。编者在序言中较详尽地论述了他的一生及其散文艺术特色，可为读者参考。

## 目 录

序言 .....	张菊香 (1)
祖先崇拜 .....	(23)
思想革命 .....	(26)
前门遇马队记 .....	(29)
美文 .....	(31)
碰伤 .....	(33)
天足 .....	(36)
一个乡民的死 .....	(38)
卖汽水的人 .....	(41)
山中杂信 .....	(45)
三个文学家的纪念 .....	(58)
自己的园地 .....	(62)
国粹与欧化 .....	(65)
《沉沦》 .....	(68)
初恋 .....	(73)
情诗 .....	(75)
地方与文艺 .....	(79)

娱园	(83)
《镜花缘》	(86)
寻路的人	(90)
北京的茶食	(92)
故乡的野菜	(94)
苦雨	(97)
沉默	(101)
苍蝇	(104)
生活之艺术	(108)
我们的敌人	(111)
死之默想	(114)
喝茶	(117)
元旦试笔	(121)
上下身	(124)
古书可读否的问题	(127)
鸟声	(129)
若子的病	(131)
唁辞	(135)
对于上海事件之感言	(138)
吃烈士	(140)
代快邮	(142)
外行的按语	(146)
乌篷船	(150)
上海气	(153)
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155)
新中国的女子	(159)

死法	(165)
谈酒	(169)
闲话四则	(173)
两个鬼	(177)
菱角	(179)
日本人的好意	(182)
人力车与斩决	(186)
怎麽说才好	(188)
偶感	(191)
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	(197)
闭户读书论	(202)
娼女礼赞	(205)
哑叭礼赞	(210)
麻醉礼赞	(213)
两株树	(216)
志摩纪念	(221)
厂甸	(225)
半农纪念	(229)
关于苦茶	(234)
冬天的蝇	(238)
文章的放蕩	(243)
畏天悯人	(249)
北平的春天	(254)
自己的文章	(258)
家之上下四旁	(263)
歌谣与名物	(272)

## 序 言

张菊香

周作人曾经走过一条曲折而复杂的历史道路。抗日战争时期，他的投敌附逆、出卖祖国的可耻行为，百口莫辩，永远不能得到国人的谅解。然而，作为一个历史典型，作为一个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散文作家，却又有他不可忽视的研究和借鉴的价值。今天，重新编选、介绍他的散文，出发点，即在于此。

周作人（1885—1967），出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是中国多难的岁月。他是鲁迅的二弟，青少年时期，和鲁迅走过几乎相同的道路：他曾在三味书屋就读，又曾在家庭的熏陶下，打下了很好的旧学的功底。因科试不中，十七岁时便步鲁迅之后，进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学习，开始接受了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初步培养了对文学的兴趣。一九〇五年便有译著《侠女奴》（即《天方夜谭》中《阿里巴巴和四十个强盗的故事》）和《玉虫缘》问世。与之同时，还创作过短篇小说《女猎人》、《好花枝》，刊载于《女子世界》。这是周作人翻译、创作生涯的起始。尽管这些著译影响甚小，至今已难找到它们的踪

影，但却留下了作家文学活动的最初的足迹。

一九〇六年秋，周作人被派赴日本去学建筑。由于他的兴趣所向在于文艺，便与鲁迅一起开始提倡文艺运动，介绍外国新文学。在日本期间，他更多的接受了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初步形成了以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为基本内容的民主主义世界观。在此期间，他曾与鲁迅合译或自己独立翻译了外国文学作品六部，并先后在《天义报》、《河南》、《民报》等杂志上发表过著译多篇。

辛亥革命前夕，周作人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活返回绍兴。初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科长、本省视学，因病辞职后被推选为绍兴县教育会会长，兼任浙江省省立第五中学等校教员。此间，他在所主编的《绍兴县教育会月刊》（后改为《绍兴教育杂志》）上发表过不少著译，并曾结集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文艺评论集——介绍希腊文学的《异域文谈》。

一九一七年春，经鲁迅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周作人来到北京大学工作，初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任纂辑员，后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

“五四”前后，周作人与鲁迅、陈独秀等人一起，积极倡导新文学运动。他先后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文章，成为新文学运动初期理论建设上的重要篇章，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五四”时期，周作人除继续翻译介绍了不少日本及西欧一些国家的作品外，还在《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晨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过大量的以杂

文为主的白话诗文创作。这些诗文，猛烈地抨击了封建礼教、封建道德，迸发着民主主义的思想光芒，贯注着浮躁凌厉的战斗意气。由于周作人在新文学运动中理论上的建树和创作、翻译上的实绩，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人物之一而蜚声文坛。

一九二〇年末，周作人患肋膜炎，次年又至西山碧云寺养病。这时，“五四”高潮已过，周作人感到了幻想破灭的悲哀。加以避世养病的机缘，遂使他的思想和艺术情趣开始发生变化。在此期间，他开始创作了一些叙事或抒情性的小品，写了不少山居杂诗、杂信，在这些诗文小品中，他坦露了思想中的矛盾，表述了在矛盾中挣扎的苦闷心情。

因胡适推荐，从一九二二年下半年起，周作人兼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后又兼女高师（即后来的女师大）教员。此外，他还先后在华北大学、平民大学、孔德学院、孔德学校、北京一师、二师等校兼课。一九二三年七月，周作人听信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的谗言，与鲁迅断交。九月，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问世。

在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中，周作人支持进步的学生运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抨击反动校长杨荫榆及北洋军阀政府，哀悼在运动中被残害的烈士。在“四·一二”蒋介石制造的反革命清党屠杀事件中，周作人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也曾进行过愤怒的抗争，对事变中被无辜处死的烈士充满同情，还对李大钊的遗属进行了长期的照护。

从“五四”到一九二七年，是周作人创作的鼎盛时

期。这一时期，他所结集的作品，除《自己的园地》外，还有《雨天的书》、《泽泻集》、《谈虎集》（上下册）、《谈龙集》以及译著多部。他的创作中表现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白话诗文建设上具有开拓性的影响，并以此奠定了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另一方面，从“五四”退潮以后，周作人思想上进与退、斗与隐的矛盾，逐日加深。他暗喻自己是“叛徒”与“隐士”的合身，是“流氓鬼”与“绅士鬼”的一体，也正说明了这种矛盾。体现在他的创作中，则一方面他创作了那些具有反帝反封建精神内容的作品，坚持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另一方面，他又“极慕着作文的平淡自然的景地”，创作了一些充满恬淡、闲适韵味的随笔小品，显示出周作人创作风格的开始转变。

大革命失败后，屈服于蒋介石的反革命高压政策，周作人提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的良方——“闭户读书论”。他说：“此刻，现在……除非你是在做官，你对于现实的中国一定会有好些不满或是不平，这些不满和不平积在你的心里，正如噎膈患者肚里的‘痞块’一样，你如没有法子把他除掉，总有一天会断送你的性命。”那么“有什么法子可以除掉这个痞块呢”，“最好是从头就不烦闷”，“其次是有了烦闷用方法消遣”。他的方法，“就是闭户读书”。《闭户读书论》的发表，标志着周作人十年“隐逸”生活的开始。

一九三〇年前后，他先后辞去在各校的兼职，专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

这一时期，周作人虽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制仍有不满，却又漠视无产阶级的兴起，抗拒马克思主义，抵制新兴的无产阶级文艺。他把无产阶级文艺也视为“载道文艺”，并诬蔑一些作家的转向左翼，是“投机趋时”。与之同时，他的文学主张也形成一种倒退。他一反“五四”时期积极战斗的文学主张，大力鼓吹文学的无目的性。他自己的创作倾向，也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写了大量有关草木虫鱼的文章和读书笔记，创作风格愈加走向闲适。

从一九二八年起，到“七七”事变前，周作人出版的散文集有《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以及译著若干。这些作品，其平和冲淡的风格已臻成熟，文字也更圆熟老练。虽也时有讽世之微词，但从总体上说，其思想的光芒已远逊于“五四”时期的创作。标志着周作人为代表的散文与以鲁迅为代表的战斗杂文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已经形成了两大对峙的流派。

“七七”事变发生后，北京大学南迁，周作人没有南下，他决定苦住北平，遂被任命为留平教授之一。最初他在燕京大学觅得客座教授职务，想以教授资格蛰居，靠著译教书为业。但软弱动摇的本性，又使他抗拒不了日本人的胁迫和汉奸朋友们的劝诱。一九三八年二月，周作人出席了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在北京饭店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从此他开始投敌附逆。

一九三九年元旦，周作人在家被刺客所袭。这一遇刺事件使周作人吓破了胆。从此，他在事敌投降的道路上更愈走愈远。随后不久，周作人辞去在燕京大学教书的职

务，接任了伪北京大学任命他为北大图书馆馆长的聘请，后又先后被北大委任为北大文学院筹备员、北京大学文学院长。

一九四一年一月，因原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病死，经王揖唐等人的劝诱，周作人出任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之后，伪华北政委会又任命周作人兼任伪北平图书馆馆长。同年五月，为庆祝伪满洲帝国十周年纪念，周作人随从汪精卫等去“新京”（长春）访问，访问结束后又随从汪精卫等一行赴南京，参加庆祝汪精卫“六十大寿”的活动，倍受汪精卫等人的青睐与礼遇。一九四二年九月在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大会上，周作人被选为评议会主席。十二月，在伪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成立大会上，周作人又被选为副总监。

一九四三年二月，伪华北政委会改组，周作人被辞去伪华北政委会常委及伪教育总署督办的职务。后又被汪伪政府追认为华北政委会委员。五月，伪华北政委会又任命周作人为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

沦陷期间，周作人曾在敌伪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数百篇，结集出版的有《秉烛谈》（沦陷前编成）、《药堂语录》、《药味集》、《药堂杂文》、《书房一角》、《秉烛后谈》、《苦口甘口》、《立春以前》等。这些作品大部分属于读书题跋笔记，一部分是或有些知识性，或全然无聊的闲适小品；一部分则是吹捧日本帝国主义、汪伪汉奸或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汉奸文学。如一九四二年四月，他为张次溪编的《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所作的《序言》中吹捧汪精卫具有“挺身犯难，忍辱负

重”，“投身饲饿虎”的精神，并对于自己留学东京时期“未得一见汪先生以至于今”而深表遗憾。在《留学的回忆》一文中，周作人又赞和着日本帝国主义者把他们侵略中国、侵略亚洲的罪恶战争，美化为“兴亚”战争，他说：当时“我们留学去的人”，“都热烈地抱着兴亚的意气的。中国人如何佩服赞叹日本的明治维新，对于日俄战争如何祈望日本的胜利，率真的说这比去年大东亚战争勃兴的时候，还要更真诚更热烈几分。”并说：“这种感情能维持到现在，什么难问题都早已解决了。”完全是一副讨好日本帝国主义的奴才嘴脸。除这类赤裸裸的汉奸作品外，周作人这个时期所写的或有些知识性，或全然无聊的闲适小品，及大量的读书题跋笔记，早已连讽世的微辞也没有了，只剩下卖弄知识，玩耍文字，文风上也“仿佛文言的分子比较多了些”。这些都说明，周作人的创作，也和其政治上一样，已由危机走向末路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随后周作人因汉奸罪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被押于北京监狱。一九四六年五月被解送至南京老虎桥监狱，并被国民党最高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周作人在狱中曾作《忠舍杂诗》、《往昔五续》、《丙戌岁暮杂诗》、《丁亥暑中杂诗》、《儿童杂事诗》和集外的应酬和题画诗共约二百多首，这些诗，或咏物，或抒怀，大多是五、七言古诗或绝句。其中《儿童杂事诗》，解放后曾在上海《亦报》上连载，后由香港崇文书店照原迹影印出版。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南京政府倒台前夕，周作

人被保释出老虎桥监狱。后寄居上海。八月回到北京。出狱后不久，周作人重新拿起笔来，撰写文章，译著作品。一九四九年末，一九五〇年初，他开始在上海《亦报》、《大报》上发表小文数百篇，其中一部分结集为《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九五六年又为各报刊撰写纪念鲁迅的文章多篇，结集为《鲁迅的青年时代》。这些著作为鲁迅研究提供了一些较有价值的资料。此外，周作人还翻译了不少希腊文学和日本文学作品。

一九六〇年末，应香港曹聚仁约，周作人开始为香港《新晚报》撰写大型回忆录《药堂谈往》，后易名《知堂回想录》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这一著作，作者回顾了一生所走的道路，记载了有关的一些人和事，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一九六七年五月，周作人病逝于北京，走完了他八十三年的生命历程。

## 二

周作人一生在创作上最主要的成就是散文小品的创作。“五四”以来，在中国新文学中“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小品文的危机》），而这与周作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新文学运动初期，周作人同鲁迅、谢冰心、朱自清等人一起，以辛勤的劳动，共同浇灌了“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于一炉的现代白话散文的早春之花，令人信服地宣告了文学革命在散文创作领域里的胜利，奠定了散文这一文学样式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并对后世的散文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这与他的散文在艺术上的杰出成就是分不开的。周作人散文艺术的主要成就，就是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成熟的散文艺术的风格——平和冲淡的风格。这种风格在中国现代散文的百花园中孑然特立、独树一帜，且其影响所及，形成了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周作人散文平和冲淡的艺术风格表现为：飘逸洒脱的文章笔势、平和恬淡的抒情特色、庄谐杂出的幽默趣味、舒徐自在的语言表达。

### 飘逸洒脱的文章笔势

文章的笔势，是形成一种独特风格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作者性格特征在艺术上最自然最成熟的表现，它是一种不持法度而又不离法度的艺术境界。周作人的散文，有一种飘逸洒脱的文章笔势，它不同于鲁迅的洞彻犀利，不同于朱自清的工笔精雕，不同于谢冰心的委婉清丽，不同于巴金、郁达夫的激情奔泻，他的散文在用笔上从容不迫、流转自如，似名士清谈、娓娓道来，无所拘羁。乍读，似构思不那么精到、结构不那么严谨，细细品味又觉其实作者是有着精巧用心的：虽飘逸而自有定格，虽洒脱而不显得枝蔓。因而，读他的散文，不觉得拘谨，不感到板滞，好象是与老朋友在一起毫无拘束而又极有兴味的闲谈，在不知不觉中，或即触着某种妙理，使你反复去咀嚼体味，甚而会长留在记忆之中。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一文中，曾谈到浙江地方的文艺传统特性，他说：“近来三百年的文艺界里可以看出有两种潮流虽然别处也有，总是以

浙江为最鲜明，我们姑且称作飘逸与深刻，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辞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这或者恰可以说明他和鲁迅散文不同的创作特色吧！鲁迅和周作人的文章都有一种不假雕饰、不慕词彩、观其气度有似等闲的大家风貌。在这“同”中，两人的文章风格却又迥然有异：鲁迅的杂文笔势尖锐泼辣、透彻犀利；周作人的散文则飘逸洒脱、风流自然。如周作人早期写的《碰伤》一文，作者意在抨击北京反动军警任意殴伤各校在新华门前索薪的教职员一事。作者没有拘泥于枯燥的说理，也没有剑拔弩张的指斥，而是似随意闲谈一样地述说：

“我以前曾有一种计划，想做一身钢甲，甲上都是尖刺，刺的长短依照猛兽最长的牙更加长二寸。穿了这甲，便可以到深山大泽里自在游行，不怕野兽的侵害。”

继而作者又谈到佛经里说蛇的几种毒中最厉害的“见毒”，谈到《唐代丛书》之一《剑侠传》所写的剑侠的飞剑可“取人头于百步之外”等等。之后，作者才引出“近日报上说有教职员学生在新华门外碰伤”的事，进行了委婉的抨击。文章看似信笔所之随意闲谈，仔细品味，方觉作者用笔能纵能擒，能放能收，飘放而不嫌迂远，洒脱而不失之于轻浮。文中的激愤感情，作者的批判态度，都掩于这种洒脱飘放的笔势之中，而显露出一种平和冲淡的格调。

二十年代后期、三十年代，周作人创作上由于更自觉的追慕着“平淡自然的景地”，这种飘逸洒脱的文章笔势也愈趋明显。如一九三六年，周作人为《论语》杂志“谈